

黄楠森 龚书铎 陈先达 主编

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YOUZHONGGUOTESHESHEHUIZHUYILUNCONG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论 丛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九五”重点项目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黄楠森 龚书铎 陈先达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黄楠森等主编.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11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

ISBN 7-209-02464-6

I. 有… II. 黄… III. 中国特色—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877 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黄楠森 龚书铎 陈先达 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 插页 44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9-02464-6
D·590 定价: 28.00 元

811121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副	主	任	陶德麟	田心铭 张士宝
委	员		黄楠森	许征帆 高鸿业
			钟哲明	郑德荣 赵明义
策划·组织		张士宝	任青	李运才

总 序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李文海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校 长

我们刚刚隆重纪念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从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如果没有在这个科学理论指导下 20 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实践,也就不可能有这一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

这套“论丛”,在 1999 年出版,从时间上说,虽然并非刻意的安排,却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80 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50 年前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前面提到的 20 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 1999 年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因此,当人们在此时估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意义时,便十分自然地会引发起从世纪历史的角度去思考的兴趣。

“社会主义”一词,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在上一个世纪末,我国的政治界和思想界就有过几次传播“社会主义”的热潮。但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还多半是作为一种学理来进行宣传和讨论,传播或者鼓吹者大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有些人即使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所了解和追求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相去甚远。直到五四运动前

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把社会主义真正作为一种长远追求的崇高目标。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在20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可以说是探索的世纪、变革的世纪、发展的世纪,而所有的探索、变革和发展,都是紧紧围绕着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就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这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的。大体说来,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终于完成了头一个历史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本世纪上半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带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探索过程中,在变革过程中,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一直到进入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此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化。在即将迈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以如此坚定的步伐,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英勇奋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创造性事业,当然也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理应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不断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使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和目的组织编写的。

在酝酿组编这套“论丛”的时候,作者、编者和出版者曾在一起做过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这套丛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一是要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这当然毫无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既然是一个完备的科学体系,自然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加以对待。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甚至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实用主义等现象,还是屡见不鲜。这种不良学风,既损害了邓小平理论的声誉,又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是应该坚决避免和反对的。二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问题,不仅要有理论的阐述和说明,而且要有对有关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剖,避免从书本到书本,空发议

论,而应始终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三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做到两个服务,即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对学术问题,要提倡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和相互切磋;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以理服人;对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同时,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既不应该回避,也不应该只限于对既往事实的经验总结,应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把理论宣传和决策咨询的作用更好地统一起来。

这套“论丛”的作者,大多是各高等学校的资深教授和学术名家,也有一部分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努力按照上面提到的编写原则,深入钻研,精心写作,共同完成了全部12种著作。对于他们严肃认真的治学作风,我代表编委会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我们也要对山东人民出版社决定组织、出版这套“论丛”以及在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致谢。至于这套丛书是否真正达到了上面所说的要求,我们只能把评判的权利交给读者朋友。不论读者朋友对作品做出什么评价,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以这套丛书,作为参与其事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告别难忘的20世纪、迎接辉煌的21世纪的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1999年1月11日

于人民大学林园

导 言

80年代曾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文化讨论的热潮,当时即被称为“文化热”。进入90年代,文化问题的讨论持续进行,到90年代中期,《中华读书报》发表《“第二次文化热”悄然升温》一文,在此后的文化讨论中,“90年代的文化热”或“第二次文化热”的概念便被较普遍地使用。

从社会背景上看,两次文化热具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它们都是在中国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的条件下发生的;在社会背景方面,90年代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

80年代的文化热已经结束了整整十年,90年代文化热中涉及的诸多问题还在继续探讨中。两次文化热中的具体论题不尽相同,热点问题讨论中一些主要观点也有较大区别,但它们都涉及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道路方向与指导思想问题,文化研究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等等。在即将告别90年代的时候,回顾总结两次文化热,对我们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这里,我们不拟对两次文化热作出全面的追溯与评判,仅就文化讨论中一些引起较大争议的热点问题作一简略的梳理。

(一) 从关于“古、今、中、外” 关系的论争谈起

80年代与90年代,文化讨论中影响大、争论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同的,即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及其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不少人指出,在两次文化热中,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也被视为两次文化热的一个显著的不同。我们也认为,从现象上看,两次文化讨论中围绕这一论题的具有轰动效应的一些观点的确颇有相左之处。我们首先对这个问题作一回顾。

1. 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西体中用

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彻底反传统”是颇为轰动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中国文化必须从总体上予以彻底否定”,“中国民族的落伍的痛苦的现实使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彻底的反传统”,“所谓‘批判的继承’,也就并不只是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中挑挑拣拣,而是要对它们的整体进行根本的改造,彻底的重建,”这些看法都很有代表性。^①

电视专题片《河殇》曾轰动一时,它将中国文化归于衰落的“黄色文明”(或内陆文明),将西方文明归于先进的“蓝色文明”(或海洋文明)。它明确提出:按照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

^① 参见《封建体制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6月9日;《选择的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力。它急切地呼唤,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还有一些人更明确地声称:中国文化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

在80年代的这次文化热当中,还有一种比较理论化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就是“西体中用”。这一论点认为:“未来的道路应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日常现实生活)和本体意识(科技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它源自西方,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包括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心理的客观存在这个实际)相结合。”有的学者对这种主张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相关争论的焦点,“西体中用”论者回避了这个问题。“笼统地主张以西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层建筑、科技思想、意识形态等等为‘体’,而不区别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有时讲‘西体’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有时又否认马列主义是‘体’,这种理论至少是混乱的。”^①有学者认为,“将‘全盘西化’论变作‘西体中用’,提法虽有不同,实质并无两样。”^②“‘西体中用’可以倒称为‘中用西体’,也就是在中国搞‘全盘西化’。”^③

“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和“西体中用”等观点当时曾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学术界,它作用于整个社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其他领域。今天回顾起来,说当时的文化热中涌动着一股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潮,应是平实之论。其实,当时便有论者尖锐指出,这些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① 《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87年1月。

② 《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87年1月。

③ 《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6期。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2. 文化保守主义

进入 90 年代,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出现了饶有兴味的现象,即“文化保守主义”(亦称“新保守主义”)的概念屡屡见诸报端,对“保守主义”的肯定也成为一种显目的倾向。

学术界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各异,在如何概括文化保守主义在 90 年代的表现形式方面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参考各方面论者的分析,包括对文化保守主义持肯定态度的论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形式一般有两种。

一种形式是主张回归传统,复兴儒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侧重强调弘扬东方文化、民族文化,提倡“复兴儒学”,希冀 21 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另一种形式是主张反思并抛弃文化激进主义,肯定与提倡“话语转换”。这些都显然与 80 年代“彻底反传统”的理论主张与文化姿态在表现形式上大相径庭。

取精华、弃糟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贵资源,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这是绝大多数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愿望。以此为宗旨所开展的学术理论研究显然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范围。另一些学者的主张则是,以儒学为主体,融合中西文化,使复兴的儒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主导力量。这种“复兴儒学”的主张一般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范围。主张“复兴儒学”的学者,有的希望形成大陆的“新儒学群体”,呼唤“大陆新儒学”,也有的自称为“新儒家”。

实际上,8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复兴儒学”的呼声。现在经常被引用的,是一位大陆学者 1989 年发表在一份台湾省杂志上的文章。文中提出:“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复兴儒学问题”,“马列主义不是西方的正统文化,而是具有破坏性的革命学

说,这使马列主义不能同作为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儒学相比,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宗教精神。因此,儒学在当今中国大陆取代马列主义的‘国教’地位,恢复其历史上曾有过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势所当然。”文章认为,只有儒学才能解决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信仰问题、道德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① 这样的主张当然并不代表所有复兴儒学论者的观点,但它所表达的意愿无疑值得关注。近年来,“新儒学”在学界的表现比较突出,“国学热”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现象(虽然学术界对是否真的出现了“国学热”还有不同认识)。

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显然是文化保守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有的论者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五四”、“文革”与80年代的“文化热”都是如此。五四运动留下的最有特色的遗产是对传统的反叛,自此,激进主义开始了横决天下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第二个高潮;80年代文化热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文化激进主义在本世纪达到了第三次高潮。论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逐渐显示了优越性,主张“学术转向”,希望知识分子坚守学术阵地,为文化运动的再出发打下稳固的基础。

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并不仅限于文化领域,政治激进主义也在其反思之列,而且,对激进主义也不仅追溯到“五四”。有的论者提出:激进主义肇始于谭嗣同,而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搞糟了;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直到今天,“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话语转换”是近年来提及文化保守主义时常见的概念。一

^① 《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鹅湖》1989年第8、9期。

个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就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而这种“话语转换”,则经常是被描述、解释为“策略”的转换。另有论者对这种反思基础上的“话语转换”表现出了某种担忧,认为:饮水思源,80年代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一口井,如果这种反省失去分寸,从反省走向否定,而且是过分否定,恐怕是无益有害,甚至有可能走向反面。不过,仿佛是回应这种忧虑,有论者提出,这种保守主义“在根本宗旨上并没有违背或放弃80年代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诉求,它对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也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不同的只是策略的变化”,它“强调门要一点一点撬开,而不能立即砸开”。^①而且,“尽管策略改变了,但由于知识分子有一种批判的天性,所以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话语仍然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②

可以看出,对激进主义进行反思的观点表面上显得比较庞杂,从论题上看,有的侧重于强调政治与学术的“分化”,推崇一种既不属于科学、民主范畴,又无工具性功能的文化价值;有的侧重于革命与改良的比较;还有的是在进行所谓对80年代的反思。不过从实质上进行分析,对激进主义的反思涵盖了对近代以来一些文化现象的认识和对一些文化观点的评价,实际上涉及对中国文化道路的认识,甚至直接触及对中国近代以来发展道路的认识。诚如对文化保守主义持肯定态度的论者所言,这种反思,以及基于这种反思的“话语转换”,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3. 一些理论问题

① 《90年代文化论争的回顾与反思》,《学术月刊》1996年4月。

② 《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它们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这一“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是历史与现实中争论已久的,也是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正确回答这一问题,一是需要充分占有资料、掌握详尽的史实,二是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从两次文化热中突显出来的上述热点,不难看出,无论两次文化热的具体论题是什么、不同的观点有怎样的消长,甚至无论“话语”如何“转换”,一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还是比较集中的。

第一,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道路方向与指导思想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应当是什么样的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我们所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要建设的当代中国文化,无疑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段论述概括回答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方向和主要内容。反观两次文化热中的一些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以西方文化为目标模式,一些复兴儒学论者,是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这都直接涉及到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道路、方向与指导思想。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也是如此。对革命的否定,是在直接质疑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选择与发展道路,应当说,这更带有某种根本性。从对话语或策略“转换”的一些评说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一些或曲折或直白的、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悖的思想和社会政治观念。

第二,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理论武器。文化会对社会经济、政治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定的文化毕竟以一定的经济、政治为基础,文化决定论、文化史观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全盘西化论者的以西方文化打破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全面效仿西方文化的主张,一些复兴儒学论者的以儒家文化统驭当代中国社会甚至挽救整个世界社会危机的主张,都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的现实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对某些文化观念生吞活剥,并夸大了精神文化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尊重史实。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时期,面对封建势力的逼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果敢地发起了对封建文化势力的冲击,并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认识,在现实的教育下,最终作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之林。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就是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革命文化,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过程中的文化创造。非历史主义地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剪裁,以主观意志“规划”中国近代的发展道路,否定革命的成果,这样的结论显然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剔除糟粕、取其精华,才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其他外来文化)的正确原则。建设好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文化,必须处理好继承、借鉴、批判、创新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源于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成果的积淀,但更要立足于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同时汲取一切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彻底反

传统与全盘西化的观点,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复兴儒学论者的一些主张,则存在以超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儒学、夸大和美化儒学的“价值”的问题。这些显然都不是辩证的态度。

(二) 对几个具体论题的梳理

涉及上述理论问题的并不仅仅是有关“古、今、中、外”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两次文化讨论中的每一个热点论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下面我们再择取两次文化热尤其是 90 年代文化热中的若干突出论题,进行一些思考。

1. 关于对五四精神的评说

两次文化热在时间上有一个巧合:第一次文化热落幕之际,恰值五四运动 70 周年;而第二次文化热,又恰逢五四运动 80 周年。两次文化热中关于五四的一些论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彻底反传统论者常常自诩为五四的继承者,作出冲决罗网式的姿态;救亡压倒启蒙论也是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到 90 年代,则出现了另外两种值得关注的取向:一是直接对五四表达的非议之声突显出来,二是对五四精神作出自由主义的诠释。

对五四的非议观点主要是认为五四时期搞了文化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的基本观念和出发点是强烈的政治指向,即以国家富强为判断标准的功利主义和以科学、民主排斥其他文化价值的信念。有的论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表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发展和文化近代化过程的误解。还有论者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采取彻底砸烂的态度,是割断了中国的文